



【庙堂江湖】

因为优步创新的是管理模式,所以,它的挑战对象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城市政府。

从优步之争看制度创新

沈凌

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之后,一直很努力地推动创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确实已经比原先更接近“创新驱动式”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和这样的判断相匹配的应该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比如最近的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优步在全世界挑战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说它是一个高科技企业,莫如说它是一个新管理企业。因为它的软件设计并不新鲜,而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出租车行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创

新。在传统的出租车管理模式中,因为技术原因保留了价格黏性,从而使得供需双方都存在效用损失。而优步借助于计算机技术,使得出租车价格更加富有弹性,从而能够增加供求双方的效用,得到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但是,因为它创新的是管理模式,所以,它的挑战对象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城市政府。这就是一个制度对决,是年轻而有朝气的年轻一代,对决于年老而暮气沉沉的一代(掌握着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大权的城市管理者应该平均年龄远超30,这是我的估计)。

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强调依法治国,从总体上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

大陆法系国家,纠结于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会不会给制度创新套上了一层枷锁呢?比如优步就挑战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交通部还拿不出一个整体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就算拖个一年半载拿出来一个方案,我也相当不看好。为什么?因为出租车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地方公共物品,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让一个中央部委去设计一个适用于全国几千个城市的改革方案,就像是春晚节目单,一定吐槽的人超过赞美的人。有必要吗?为什么不学一学邓公,让地方政府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来呢?

这样的对决当然还考验着地方政府中管理出租车这个行业的管理者的

政治决断力。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制度转型中,当我们遇到合法违法的判断问题时,我们首先不是把违法的一关了之,而是应该先问一下:究竟是违法的错了呢,还是被违法的法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了呢?

执法部门去严格执法,对执法部门而言并没有错。但是如果立法部门没有广开言路,让社会各个利益阶层有一个讨论的空间,从而能够按照一个民主程序去修正现有的不合法规,那么严格执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为一个部门利益而消费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创新社会的建立。

出租车行业的不合理制度早在优步滴滴出现之前,已经被社会各界广

泛诟病,但是交管部门无动于衷,或许是他们苦于创新能力不足,拿不出一个改革方案来。今天新的选项已经出现,颠覆了原来的出租车行业运营模式,是更加激起了原来管理部门的不满呢,还是帮助原有管理部门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难题呢?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蒸汽机新时代开启时的马车夫的不满,但是马车夫能够永远抵抗住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吗?

所以,无论从哪一层面的制度创新上看,我们都期待政府能够优一步!如果能够让中国民众的创造力不再受到不必要的束缚,那么中国的未来岂是7%的增长率能限制得了的?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说法不武】

期待“利益输送”等央企通病通过巡视整改下猛药得到有效的根治。

多家央企不堪一巡折射央企通病

刘武俊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专栏,对外公布6家被巡视央企巡视反馈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本轮巡视期间两个月的时间里,26家央企中已有至少20名高管被查。在公布反馈情况中,6家被巡视央企均有领导人员问题线索被转至中纪委、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反馈期间,作为腐败问题易发地的央企是否将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已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以此次巡视的上海大型国企为例,巡视组称,该企业“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少数领导人员以“钢”谋私,聚敛钱财;部分领导人员亲属子女围绕该企业经商办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同时,该企业部分项目违规

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部分重大投资涉嫌利益输送,一些项目在资产并购或处置过程中买贱卖贵,海外资产管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其他几家被巡视的央企同样问题严重。中远和中船均由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在巡视中,两家央企都暴露出领导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违规牟利的问题。

中远集团一些领导人员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开办关联公司承揽大量业务,涉嫌利益输送。巡视组还指出中远集团经营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廉洁风险。中建和华能均由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两家公司都被指出了重点领域监管方面的腐败问题、招标的违规问题,同时也都暴露出配偶、子女等亲属的关联问题。巡视组指出,华能集团对下级单位及其负责人管控不力,违纪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同时,有的领导人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有的为配偶、子女、亲属等从事关联交易提供便利。

央企巡视反馈之后亟待交出真正合格的整改答卷,而不只是一堆问题清单。公众期望巡视反馈情况“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特别是对“利益输送”、“以钢”谋私、重大经营决策失误等巡视中的突出问题,要有切实的查处答卷及整改措施,决不能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上述6家央企如何整治在“利益输送”方面的通病,这不仅关系国企改革工作,对于更为深远的国企改革也有重要意义。

建议对6家被巡视央企适时杀个“回马枪”,检查整改措施是否真正到位、看看究竟是真整改还是走过场表面应付。“回马枪”必须动真格,而不能“虚晃一枪”,对于整改不力、老问题反

弹严重的应当坚决问责。“回马枪”也是专项巡视的一种有效方式。王岐山同志曾经强调过,“监督不是一阵风,要针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或部门杀个回马枪,强化震慑、不敢、知止的氛围”。所谓“回马枪”,就是对已巡视过的单位,事先不确定,进行回访式巡视,检查整改成效,发现新的问题。“回马枪”其实是专项巡视的一种形式,是这一“新型有力武器”的“杀手锏”之一。

这13家单位不要以为已经经过专项巡视就尘埃落定万事大吉,对于整改的问题得过去且过应付了事。要通过“回马枪”,倒逼被巡视单位真正将整改问题落到实处。“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可以有效遏制钻空子、做表面文章等问题,进一步巩固巡视成果。显然,一旦杀出“回马枪”,动用“特遣奇兵”,机动灵活、直切要害,那么被巡视

过的单位也就不敢草率应付了事。

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和报告腐败线索,但是巡视反腐不能只是交了“问题清单”了事,必须给公众一个满意的整改答卷。对于被巡视单位的整改报告是否合格,巡视组有发言权,人民群众更有发言权和评判权。有关部门要善于收集网络等方面对整改报告的反馈意见,对整改实效作出科学的评估,不合格的要坚决“补课”。

诸多央企不堪一“巡”,折射出利益输送等央企通病“非一日之寒”,曝光的问题必须给公众一个调查处理的回应,而被巡视央企也要提交合格的“整改答卷”,真正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整改效果。期待“利益输送”等央企通病通过巡视整改下猛药得到有效的根治。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金瓶商话】

即使是在晚明,维护纪纲的章法也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西门庆有没有工作餐

黄波

近日收到王国华先生主编的《2014中国杂文年选》,随手一翻就看到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西门庆不吃工作餐》。

“工作餐”这东西,近年来颇有好事者考证,但因为史料来源不一和考证者不同的角度,答案常常让人困惑。如有一篇文章中说,“古代工作餐叫‘公膳’,东周人吃过,最开始是配给令尹(相当于宰相)子文吃的。子文这人肠胃不好,上早朝就饿,精气神不足。楚成王不忍心,每天都为他准备点熟肉干粮做零食。《左传》记载,‘公膳日双鸡’,说明春秋时期,卿大夫们的工作餐标准不低,每顿饭都有两只鸡”。其实无论是楚王一时的善意,还是专门规定了一个“公膳日”,类似资料似

乎都无法证明公职人员享用工作餐已成为制度。

相反,史料倒是显示,直到东汉,工作餐还没有成为定制。《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有次巡夜尚书台,看见某值班人员半夜吃糟糠充饥,大为震动,翌日下诏:今后尚书台官员值夜,均由朝廷供应夜宵和早餐,并提供被褥枕头及服务人员两名听候使唤。有人在引用这条资料后下判断曰:“从此,古代的公务员们就开始有了‘免费的早餐’。”这个判断未免太大胆了一点,汉明帝所下的明明是一道特旨,从这道圣旨中受益的明明也只是尚书台值班的官员,如何能够旁及其他?

严格意义上的工作餐制度应确立于唐朝。唐太宗励精图治,和大臣们讨论决策的事务太多,决定延长朝会的时间,早朝时间约在凌晨5至7点。由

于大臣们奔往朝堂的时间太早,会议时间又相当久,势必造成误餐,唐太宗遂“聊备薄菲”,这意味着参加朝会的官员都可享受一顿免费的“朝食”。

到了《金瓶梅》所描写的晚明时代,工作餐制度如何?《西门庆不吃工作餐》一文开始就写道:“西门庆官至山东提刑所掌刑千户,这官应该说是买的,说是跑的也行,反正来路不正。不过翻《金瓶梅》,西门庆在上班之余,比如中午、晚上,基本都在家里吃饭,或者自己请客,或者被人请,很难一见吃工作餐的身影。”西门庆为什么不吃工作餐,作者的答案是,“他不是京官,没资格参加朝会,享受不到工作餐福利。”

西门庆不吃工作餐,原因是他吃不到工作餐,没有吃工作餐的资格,这个推断没有问题。但西门庆吃不到工

作餐是否就因为他不是京官不能参加朝会?按此推理,在晚明,只要够格参加朝会的京官就都可以享受免费工作餐了,实际并非如此。

先看一段《明史》的记载。按朝廷制度,内阁辅臣日给酒馔,共食之。嘉靖朝的辅臣夏言因为家资丰厚,要求朝廷不必为他准备饭食,自携酒肴甚丰,器物皆用金。而另一位辅臣严嵩则食官家所供,草草而毕。二人对案而食,拥有佳肴的夏言“不以一匕及焉”。这段记载十分生动,夏言的霸道和严嵩的虚伪皆历历可见。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晚明工作餐的端倪。

“日给酒馔”,似乎晚明京官们都有享受工作餐福利的资格,但不要忘记夏言和严嵩都在内阁辅臣高位上这个事实。明朝的辅臣即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明史》中强调内阁辅臣日给酒

馔,岂不等于告诉人们,晚明时代辅臣之外的其他大臣无法得到同等的待遇?和其他资料参证,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答案。根据《明会要》,明初,朝廷对参加朝会的官员有“赐食”制度。但由于支出浩大,有资格吃到工作餐的大臣日见其少,直到明英宗时期,工作餐制度已基本废除,只剩下年节的一两次集体会餐了。易言之,在晚明时代,像严嵩和夏言这样,朝廷“日给酒馔”不过是皇帝特别的优礼,而不是一种成熟的工作餐制度。

西门庆不吃工作餐,实由于其没有工作餐可吃。在吃饭问题上,不仅是他这样的“佐杂小吏”,许多京官大佬也指不到啥油。就此而言,即使是在晚明,维护纪纲的章法也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北京市政府东迁传言与互联网商业模式

刘彬: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传言背后

最近甚嚣尘上的传言,与北京市规划版本保持一致,显然不是纯属巧合。不过与各地通过政府搬迁带动新城经济发展的做法不同,北京市没有计划将政府迁往更富经济吸引力的南部地区,而是迁往东部,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南部发展落后,下风下水,不符合老北京人对办公居住的要求。二是东部靠近燕郊,甚至整个廊坊,北京市向东发展,有利于扩充行政地域。三是从城市结构上看,中央机关在西,北京市政府在东,整合形成东西两个中心,挑起北京城的大格局。

当然,从交通上看,这样的布局也会加重长安街沿线的交通压力,特别

是CBD地区压力更大。因此,东部设副中心,应该自成一体,实现工作和居住的统一布局,而非功能割裂。

北京市政府东迁,这只是北京市布局的一个设想,以强化首都功能角度看,迁府只是一个开头,毕竟北京市政府规模不大,而且作为地方政府,也有管理北京城的重任在肩。因此,北京市政府东迁成真,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头,更大的动静应该在后面。就首都功能看,北京应该是政治、文化和科研中心,大量的央企总部及其下属机构,根本没有留在北京的必要性。只有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才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之役。因此,下一步棋是动央企。需要注意的是,央企迁址应该按照产业布局特点进行,而不是一窝蜂地再扎堆京城周边。当然,央企东迁一定存在利益博弈,比起市政府,央企的

利益链条更长,而且与北京市税收联系密切。如何切断这种利益格局,才是中央的难题。如果下定决心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必须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消除其繁殖功能,从根子上消除北京城市扩张的冲动。

梁建章:互联网带来的最根本变化

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规律,那就是客户来得容易但去得容易,任何竞争对手的APP与你的客户之间,都只有手指点几下的距离。网络经济中没有太高的客户忠诚度,当一些公司只靠亏钱拉客时,他们很可能永远都亏钱。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超额利润的。当大家

都想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赚钱时,结果是大家都挣不到钱。所以,现在备受鼓励的某些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经营赚钱方式肯定是短命的。

那么,互联网公司如何赚钱呢?在工业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机器、地段、资源的控制来保持比较长的竞争优势。在互联网时代,物理资本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更糟糕的是,客户没有忠诚度,竞争对手可以随时跨界进入。互联网公司要赚钱,就只有持续创新,不断提升效率和客户体验。而要做到持续的创新,没有其他任何捷径,只有靠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创造性人才。

企业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创新的人才环境,这其中包括充分的授权、丰厚的薪水和类似创业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正因为如此,包括携程在内的很多网络公司,都推出了鼓励内

部创业和创新的人才机制,目的是要培育企业在人力资本和创造力上的持续优势。

我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最根本变化,就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网络时代,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在不断上涨,对他们进行股权激励的力度也在不断提升。从宏观经济来说,未来人力资本的回报相对于金融资本会提升,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收入占社会财富的比例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崛起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的才能更受尊重,而不是其身份、地位和掌握的资源。而当一个社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而不是“资本”时,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平等、理性和民主。



在微信的海洋里
采撷最精彩的浪花